

何之元《梁典》述论

唐燮军

(宁波大学 文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何之元的生前行迹, 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史学观念及其《梁典》的史书结构与书法。据《梁典》佚文, 既可推知该书始作于何氏任职北齐期间, 定稿于归降陈朝之后, 又可考见其大致的史料来源、编纂体例及何氏的著述旨趣。总体而言, 《梁典》无论史料抑或史学, 均乏善可称, 从而例证了编年体史书在南朝时期日益衰微之事实。

关键词: 行踪; 编年史; 史书结构; 史学观念

中图分类号: K2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7)03-0087-07

南朝何之元(?—593年)私撰的《梁典》, 作为记载梁代史事的编年体史书之一, 至迟亡佚于北宋初年^①, 故当司马光等人编著《资治通鉴》时, 未曾只字提及。后人除梅鼎祚《陈文纪》、严可均《全陈文》等类书辗转引述其佚文外, 予以评鹭者仅朱明镐《史纠》、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而已。今人对其研究很少, 除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等论著曾附带论及外, 作为专题研究成果者, 也只有陈光崇《刘璠、何之元各撰〈梁典〉》札记一则。

在今人的研究成果中, 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陈光崇对于《史通·古今正史》“庐江何之元、沛国刘璠以所闻见, 究其始末, 合撰《梁典》三十篇”之说的考辨^②, 其实姚振宗早已为之^③。又如周一良先生的下列推断, 亦并未建立在严肃的文献考证的基础上:

(千宝《晋纪·总论》、裴子野《宋略·总论》、何之元《梁典·总论》)东晋南朝史家这三篇总论,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南方玄学盛行后, 史家思路开阔, 视野放大, 思辨能力提高, 因而更有可能宏观地观察一代的发展变化。^④至于《中国史学发展史》的相关结论, 同样值得商榷。何《典》将梁代史事依其兴亡盛衰之迹分为六“意”的措置, 诚为“独树一帜者”^⑤, 却未必如尹达等人所云“进一步加强了史书的政治内容和对历史演变过程的描叙”^⑥。

何《典》研究的如此现状, 一是因为其亡佚已久, 二是因为研究者未曾对何氏生平及其《梁典》文本展开讨论。有鉴于此, 本文首先从梳理何氏行踪入手, 考察它与《梁典》构造及书法的内在关联, 然后据其传世佚文, 探讨该书的撰述时间、史料来源、编纂体例及著述旨趣诸问题, 在此基础上, 将其置于编年体史书在汉末两晋南朝的流程之中略作评述, 以期有助于深化对何《典》的认知。

① 或以《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分别载有何《典》佚文为据, 而疑其非, 且以《梁典高祖事论》(即《梁典·总论》)为例证成之。见录于《文苑英华》卷754的这篇史论, 不但讹文错字所在多有, 而且将著者之名倒作“元之”。这理当是编著者李昉等人无从亲睹何《典》原文而不得不转抄他书所致。

② 陈光崇《读史札记》之二《刘璠、何之元各撰〈梁典〉》, 载氏著《中国史学史论丛》,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333—335页。

③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12, 《二十五史补编》, 中华书局, 1955年, 第5266页。在陈氏之前, 吕思勉先生也曾怀疑“合”乃“各”之误, 详参氏著《两晋南北朝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第1401—1402页。

④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12, 《二十五史补编》, 中华书局, 1955年, 第5266页。在陈氏之前, 吕思勉先生也曾怀疑“合”乃“各”之误, 详参氏著《两晋南北朝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第1401—1402页。

⑤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 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87页。对于周氏此论, 胡宝国先生颇有辨正, 详参氏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第123—127页。

⑥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第二章之七《史体之发达》, 载氏著《经史抉原》, 巴蜀书社1995年版, 第288页。

⑦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第119页。

收稿日期: 2006-04-11

作者简介: 唐燮军(1972—), 浙江宁波人, 宁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华东师大历史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自魏晋之际何桢孤微发迹以来，庐江何氏家族可谓“累世昌阜”^①。但作为其中的庶宗旁支，何之元一系却长期仕宦不达。其祖僧达仕齐仅至南台治书侍御史，其父法胜甚至终身未仕，而其本人也只是在袁昂的大力荐举下，方始得以入仕梁朝，此则《陈书·文学传》言之甚详：

何之元，庐江濡人也。祖僧达，齐南台治书侍御史。父法胜，以行业闻。之元幼好学，有才思，居丧过礼，为梁司空袁昂所重。天监末，昂表荐之，因得召见。解褐梁太尉临川王扬州议曹从事史，寻转主簿。

对于此段史料，严可均、姚振宗、曹道衡等人皆未及加以细辨，遂将何氏之释褐误系于梁武帝天监末年^②。但考《梁书·武帝纪下》，临川王萧宏直至普通元年（520）正月方才晋升太尉、扬州刺史，此则何氏起家之时，理当在此际或翌年。

由布衣草莱而为朝廷命官，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转变，使何氏在感恩之余而生效忠梁室之志。当侯景乱梁，以太尉承制的武陵王萧纪，非但不思勤王赴难，反而在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年）自成都举兵东下，企图攻占荆州以扩充地盘，进而争夺帝位之际，刚被萧纪署为南梁州长史、北巴西太守的何之元，“与蜀中人庶抗表请无行”，结果被囚禁于舰中^③。何氏的这种政治倾向，既是他潜心撰述《梁典》的动因之一，也使得其书不能不深具“亲梁”色彩。这种色彩，一方面相当明显地表现在为梁武帝歌功颂德，如《梁典·总论》云：

齐季昏虐，政由群小，朝宰被无辜之诛，藩戚惧淫刑之害。高祖痛兄弟之戮，因天下之心，举荆、雍之师，兴汤、武之伐。……师不疲劳，民无怨黜，乐推斯在，代德是膺，逆取顺治，享年四纪。……于是广开庠序，敦劝后生，亲自观试，策其优劣，由近及远，咸从风化，执经者连袂，负笈者排肩，济济多士，于斯为盛。

另一方面，又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为梁朝的由盛转衰痛心疾首，《梁典·总论》所谓“屈子投江，宁论其痛，贾生恸哭，岂喻其悲”，即是其中显例。

大宝元年的那次军事行动，虽由于黎州民变和西魏入侵而被迫中断，但萧纪未曾须臾断绝入主大统之邪念，故当大宝三年（552年）四月益州政局稍趋稳定，就迫不及待地称帝于成都，并于八月间东下攻打盘踞荆州的湘东王萧绎（即后来的梁元帝）。在这场持续将近一年的兄弟阋墙之战中，萧纪主要因为其益州根据地受到西魏攻击的关系，几乎从一开始就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并最终在梁元帝承圣二年（553）七月败死峡口^④。

史称“及武陵兵败，之元从邵陵太守刘棻之郡”^⑤。考《梁书·武陵王纪传》，刘棻本为梁元帝麾下的宣猛将军，盖因平定萧纪之乱而得以升任邵陵太守。何氏既随刘棻出守邵陵，事实上也就意味着他从此成为梁元帝的臣民。所以，何氏在《梁典·总论》中，对梁元帝虽不乏责让之词，但更多的却是颂扬之语，甚至将之与管仲相提并论：

世祖聪明特达，才艺兼美，诗笔之丽，罕与为匹，伎能之事，无所不该。……至于帷筹将略，朝野所推，遂乃拨乱反正，夷凶殄逆，纽地维之已绝，扶天柱之将倾。黔首蒙拯溺之恩，苍生荷仁寿之惠。微管之力，民其戎乎？

曾经身为梁元帝臣民的这段人生经历，对于何《典》的影响又不止此。据《梁典序》可知，何之元在构思其书框架时，拒不承认简文帝的法统地位，转而以元帝直接上承武帝。对于这种取舍，何氏自我解释说：

洎高祖晏驾之年，太宗幽辱之岁，讴歌狱讼，向西陬不向东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礼乐，归世祖不归太宗。拨乱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勋有属。今以如干卷为《世祖》。……至在太宗，虽加美溢，而大宝之号，世所不遵，盖以拘于贼景故也。承圣纪历，自接太清，神笔诏书，非宜辄改，详之后论，盖有理焉^⑥。

但何氏此说显系虚美附会，因为仅以梁元帝的政治影响力而论，即便在他称帝之后也仍然相当有限，譬如《资治通鉴》卷164《梁纪二十》“元帝承圣元年”条就曾提到：

十一月，丙子，世祖即位于江陵，改元，大赦。……侯景之乱，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长江为限，荆州界北尽武宁，西拒峡口，岭南复为萧勃所据，召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户著籍，不盈三万而已。

似无疑义，何氏之所以如此取舍，显然别有缘故；推原其因，大抵就在于元帝对简文帝建康政权合法性的否认。这种否定，见诸《梁书·元帝纪》，即有“大宝元年，世祖犹称太清四年。……大宝二年，世祖犹称太清五年。……大宝三年，世祖犹称太清六年”之记载。

然而，简文帝的建康政府固然历时短暂，元帝的江陵政权也未能维持多久，时至承圣三年（554年）十一月即为西魏所灭。次年正月，邵陵太守刘棻在兵援江陵途中为部曲宋文彻所害，尔后在二月间，“故刘棻主帅赵朗杀宋文彻，以邵陵归于王琳”^⑦。大约就在此际，何之元被湘州刺史王琳召为记室参军，由此厕身王琳幕府。从《陈书·文学传》的相关记载来看，何氏显然颇得王琳之委信，故当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年）正月王琳进位司空，随即转任司空府谘议参军，并领记室；时值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三月，王琳在北齐支持下拥立梁永嘉王萧庄为帝，又被提拔为中书侍郎。由此当可断言，何氏对

①《三国志》卷11《魏书·管宁传》注引《文士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63页。

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陈文》卷5何之元传略，中华书局，1958年，第3428页；《隋书经籍志考证》卷12，第5266页；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卷4“何之元行年”条，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60页。

③《陈书》卷34《文学·何之元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466页。长史，《南史·文学·何之元传》误作“刺史”。

④详参《梁书》卷55《武陵王纪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826—828页。

⑤《南史》卷72《文学·何之元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789页。刘棻，《陈书·文学·何之元传》误作“刘恭”。

⑥《陈书》卷34《文学传》所录何之元《梁典序》，第467页。

⑦《资治通鉴》卷166《梁纪二十二》“敬帝绍泰元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5128页。

王琳必然心存感激。也部分因此之故，他不但特辟《后嗣主》一“意”以详载王氏“崇立后嗣”^①之始末，而且深致褒美，此则见诸《梁典·总论》，即有“骠骑王琳，怀申胥之志，蕴荀息之忠，爱纳嗣君，更绍颓运”之称颂。

永定三年（559年）十月，北齐文宣帝暴崩。何之元接受王琳的派遣北上赴吊，但当他完成使命返至寿春，王琳已在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二月，为陈将侯瑱所败而投奔北齐，于是也就滞留寿春，并在北齐政府中任职扬州别驾，直至陈宣帝太建五年（573年）。任职异族政权，对于急需政治避难的何之元来说，虽然是迫不得已的抉择，但此后十余年的宦海生涯，却无疑极大地改变了他的史学观念，使之不再拘泥于自东晋以来长期盛行的华夷之辨，转而正视并承认从梁、北魏南北对峙到梁、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三足鼎立的这一客观事实，故其《梁典序》云：

若夫狁狁孔炽，鯁我中原，始自一君，终为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为北魏，既分之后高氏所辅为东魏，宇文所挟为西魏，所以相分别也。

何氏的此种史观据说“为隋唐所遵”，“实为影响隋唐两认正统的关键”^②。虽然雷家骥先生的这个推论明显缺乏史料佐证，但何氏的此种史观，在南北朝分治对立、南北史家竞相贬斥对方为僭越的当时，确实有其独特性。

陈宣帝自从篡位以来，一则为提高自己的政治威望以利于统治，二则为改变北境防务的空虚以谋求长治久安，三则为解决军队安遣问题以缓和社会矛盾，因而积极筹划用兵北齐^③，并最终在太建五年三月，诏令吴明彻统众十万分东西两路北伐。陈军的这次北上可谓势如破竹，同年十月即取得了攻克寿阳、擒斩王琳的战绩，至十二月间，更是一度收复了侯景作乱时为北齐所侵占的淮南江北之地^④。《陈书·文学传》称何氏就在此际接受招安，从此成为始兴王陈叔陵的幕僚：

及众军北伐，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兴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赍书召之元。之元始与朝庭有隙，及书至，大惶恐，读书至“孔璋无罪，左车见用”，之元仰而叹曰：“辞旨若此，岂欺我哉？”遂随咸至湘州。

史称“始兴王叔陵骄恣，阴结死士，图为不逞”^⑤，招揽何之元当是其“阴结死士”之一例。但何氏似乎并不乐于为之效劳，故时至太建八年（576年）方被任为中卫府功曹参军，在转任中卫府谘议参军后更是长期未得迁职。尽管如此，在太建十四年（582年）正月始兴王叔陵未遂事件发生后，他还是受到了株连，此观《陈书》卷32《孝行·谢贞传》可知：

及始兴王叔陵为扬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为记室，辟贞为主簿，贞不得已乃行。……贞度叔陵将有异志，因与卓自疏于王，……俄而高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连逮，唯贞与卓独不坐。

于是此后，“之元乃屏绝人事，锐精著述。”^⑥何氏原本就对陈氏政权没有好感，在蒙受始兴王弑逆未遂事件之株连后，其情理当更甚，这也可能是他将《梁典》叙事下限定在陈宣帝太建五年的又一缘故。

历观何氏生前行迹，大抵可分为三期。第一期自梁武帝普通初年释褐至梁元帝承圣四年，在这三十余年间，尽管世局由治转乱，但他始终心系梁室安危。此后直至陈宣帝太建五年底为第二期，其时限与何氏本人所界定的“后嗣主”时期完全一致，期间无论是拥立萧庄以抗衡陈朝，还是北上寻求政治避难，他都始终追随王琳。第三期始自南归，迄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辞世，在这二十年间，其人生轨迹主要由于外力的作用，最终发生了由从政到问学的根本性转变。由此可见，《梁典》无论史书结构抑或书法，均与何氏的行踪及其心路历程，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内在关联。正因如此，欲探究何《典》，必当首先着眼于此。

二

民国时期的陶栋，虽曾致力于辑录何《典》佚文，但其辑本不仅有所遗漏，而且无视《梁典序》有关该书结构分为六“意”的记载，机械地将辑自《文选》李善注的十二条佚文，割裂为《高祖纪略》和《到徐二王传略》。更为欠缺的是，陶氏辑本仅仅移录佚文而已，既不曾加以笺释，也未尝将之与姚氏《梁书》、李延寿《南史》等书的相关记载加以比对。为便于说明问题，条录所见佚文于下表，并分别置于某“意”之下。

在这些传世佚文之中，《梁典序》就其体例而言，其实就是当时史家所普遍采用的“条例”，用以说明撰述宗旨、拟定编纂体例。据此序，不但可知何《典》的史书结构，也可略知其史学观念。至于理当置于全书之末的《梁典·总论》^⑦，这篇对全书内容作总括性评述的史论，在《文苑英华》、《经济类编》、《陈文纪》等类书中被名为“《梁典高祖事论》”，而在《渊鉴类函》中又被题作“《梁典论》”；鉴于其所论对象实不止于武帝一朝之事，而是对整个梁代史事的全面论述，故此从《全陈文》作“《梁典·总论》”。从《梁典·总论》注重对比古今史实的行文风格、强调渐变的历史观来看，其与《宋略·总论》最为近似，极有可能是模拟《宋略·总论》而成。不过，虽然《序》及《总论》保存得相对较为完整，但行文之间仍有较大的跳跃性，似乎并非原貌。

何之元《梁典》佚文一览表

① 《陈书》卷34《文学传》所录何之元《梁典序》，第467页。

② 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536页、第583页注87。

③ 吕春盛《陈朝的政治结构与族群问题》，（台湾）稻乡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164页。

④ 《资治通鉴》卷171《陈纪五》“宣帝太建五年”条，第5317、5328、5332页。

⑤ 《隋书》卷22《五行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629页。

⑥ 《陈书》卷34《文学·何之元传》，第466页。

⑦ 前揭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以为《总论》当位于全书之末，此从其说。

佚文	所在	补注
1、《梁典序》（文长不具录）	《陈书·文学传》、《册府元龟》卷 555、《陈文纪》卷 8、《全陈文》卷 5	当在全书之首
2、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姓萧氏，本兰陵郡县中都里人也。	《文选》卷 40 任昉《百辟劝进今上笺》李善注	可归入《追述》
3、高祖起家齐巴陵王法曹。	《文选》卷 36 任昉《宣德皇后令》李善注	
4、高祖为法曹，以后进之秀，与沈约等八人为竟陵王文学。	《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卷 71 任昉《宣德皇后令》陆善经注 ^①	
5、高祖迁仪同王俭东阁祭酒。	《文选》卷 36 任昉《宣德皇后令》李善注	
6、司州刺史萧诞被杀，高祖监司州。		
7、虏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据樊城。		
8、齐明帝崩，遗诏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拥南康王宝融以主号令，以高祖督前锋。三年十二月，义旗发自襄阳；己酉，檄京师。	《文选》卷 56 陆倕《石阙铭》李善注	
9、东昏即位，嬖近群小，诛高祖兄懿、弟畅。	《文选》卷 36 任昉《宣德皇后令》李善注	
10、高祖密与吕僧珍谋为内伐。		
11、天监，武帝年号也。	《文选》卷 36 任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首》李善注	可归入《叙乱》
12、高祖即位，以宏为临川郡王。天监三年，以宏为中军将军。	《文选》卷 43 丘迟《与陈伯之书》李善注	
13、天监五年，前平南将军陈伯之以其众自寿阳归降。		
14、到溉字茂灌，为司徒长史。	《文选》卷 22 徐敬业《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李善注	
15、徐勉第三息悝，字敬业，晋安内史，有学业，最知名。卒于郡府。		
16、侍中、领右骁骑王骞，字思晦，太尉文宪公长子也。左仆射王暕，字思寂，文宪公次子也。	《文选》卷 38 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李善注	
17、刘訔字彦度，与陈留阮孝绪同申金兰之契，筑室钟阜之傍，共听内义，钻寻奥典。	《太平御览》卷 408、《永乐大典》卷 12017、《渊鉴类函》卷 252、《天中记》卷 20、何良俊《语林》卷 16、《分类字锦》卷 13、《佩文韵府》卷 46 之一	
18、文叔得尹遵之降而隗嚣灭，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孙皓平。	《史通·杂说下》自注	可归入《叙乱》
19、《梁典·总论》（文长不具录）	《文苑英华》卷 754、《经济类编》卷 6、《陈文纪》卷 8、《渊鉴类函》卷 44、《全陈文》卷 5	当在全书之末

编号第 2 至 18 的何《典》佚文，除第 18 条因系语录故有可能是原文外，其余十六条因后人在转引时主要是从引述典故的角度加以摘抄而非照录原文，故大多时序不明、首尾不完，据此难以见出何《典》作为编年体史书的固有特征。从所述内容来看，有个别佚文如第 17、18 条，不见于姚氏《梁书》及《南史》，可补正史之阙，但其他佚文（第 2—10 条、第 12—16 条），叙事并不准确甚至有误。这其中，有因褒谏而致误者，如第 8 条“齐明帝崩，遗诏授高祖雍州刺史”句，稽诸史册，除《南史·梁本纪上》外，《南齐书·明帝纪》、《梁书·武帝纪上》、《南史·齐本纪下》及《资治通鉴》卷 141《齐纪七》“明帝永泰元年”条，皆云萧衍出刺雍州在前、齐明帝驾崩在后，且遗诏中并无授萧衍雍州刺史事；当然更多的，缘自何氏笔误或其所据文献记载不实，譬如姚《书》及徐勉本人所撰之《答客喻》，皆称徐悝乃徐勉次子^②，但何《典》却记作“徐勉第三息悝”。总体而言，这些流传至今的何《典》佚文多非实录，史料价值不大，进而言之，何氏此书不但逊色于刘璠《梁典》^③，

① 《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 册，第 197 页。又，本表第 3、5、7、9、10 条佚文，并见该书第 2 册，第 196、196 - 197、201、203、203 页，但文字略有出入。
《梁书》卷 25《徐勉传》，第 386 页。

刘璠《梁典》今亦亡佚，故无从全面比较两书之异同。但考其传世佚文，不仅在数量上多于何氏《梁典》，而且在可信度

更不如姚氏父子递作的《梁书》。

不过,表中所列的这十九条佚文,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却是研究何氏及其《梁典》的不可或缺的直接依据。譬如第2—9条佚文,皆将篡位之前的萧衍称为“高祖”,这就充分反映出何之元“亲梁”的政治立场。又如第1、19这两条佚文,对于探究何《典》的撰述时间、史料来源、编纂体例、著述旨趣诸问题,皆有莫大的助益。

对于何《典》的撰述时间,《陈书·文学传》语焉不详,但云“及叔陵诛,之元乃屏绝人事,锐精著述”。而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竟据此贸然断言:“之元之书,始作于陈后主即位之岁。因始兴王叔陵行弑伏诛,之元为其官属,幸而得免,故屏绝人事,一意著书。”其后,刘汝霖、陈光崇、杨翼骥亦皆持此论^①。但此说显然乖谬,此观《梁典·总论》可知:

之元官自有梁,备观成败,昔因出轴,流寓齐都,穷愁著书,窃慕虞子,但梁室极促,简牍多阙,所得遗逸,略不
尽举。未获旋反,更穷搜访,采其闻见者,撮其众家,一代之事,可得观矣。

据此可以断言:何《典》之作,不但早于“陈后主即位之岁”,而且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始自天嘉元年(560年)何氏任职北齐之后,下迄太建五年(573年)底南归;在这十余年间,何氏虽有志汇辑梁代旧事以编次成帙,却在史料收集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此一阶段,他很可能参考了成书于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554年)的魏收《魏书》,因为何《典》第9条佚文与《魏书·岛夷萧道成传》所犯错误完全相同^②。后期始于太建十四年(582年)正月始兴王作乱未遂,其下限虽难以确知,但似乎不应晚于祯明三年(589年)陈朝亡国之时;期间,何氏在已有基础上“更穷搜访”,最终泐成《梁典》三十卷。

从其“更穷搜访,采其闻见者,撮其众家”的自述来看,何《典》据以成书的史料无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就是他南归后所接触到的口碑传闻,其二就是他多方网罗而获得的众多相关著述。从理论上说,凡成书于何《典》之前的所有载录梁代史事的纪传、编年、杂传、地志、谱牒、文集,皆有可能为何氏所参取;这其中,沈约《高祖纪》14卷、萧子显《普通北伐记》5卷、周兴嗣《皇帝实录》3卷(记武帝事)、《梁大同起居注》10卷、萧韶《太清纪》10卷、刘仲威《梁承圣中兴略》10卷、谢昊《梁皇帝实录》5卷(记元帝事)及其《梁书》100卷、许亨《梁史》^③等史书,相对而言可能性更大。

对于收集而来的体裁不同、风格迥异的各类史料,何之元做了“重以盖彰殊体,繁省异文”^④的处理,以使之有别于简单的史料汇编^⑤。也正是在较为广泛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何氏对梁代历史的演进脉络及其阶段性发展特征,形成了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历史观:“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区宇宁晏,太清以后,寇盗交侵,首尾而言,未为尽美”^⑥。这种客观认识和他的因人生遭际而产生的主观爱憎,两者交互作用,遂使之依梁朝兴衰存亡之迹将全书分为六“意”:《追述》讨寻梁武帝在齐末的发迹之路,《太平》称述梁朝渐趋全盛之气象,《叙乱》备载侯景乱梁之经过,《世祖》牒叙江陵政权之始末,《敬帝》专记梁陈“禅让”之详情,《后嗣主》颂扬王琳延续梁祚之功绩。

由此也就牵涉到何之元撰述《梁典》的旨趣,对此,《陈书·文学·何之元传》将之理解为:

(何氏)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究其始终,起齐永元元年(499),迄于王琳遇获(573),七十五年行事,草创为三十卷,号曰《梁典》。

近者,向世陵先生断言何氏著书之旨,就是有意“以梁之兴亡盛衰之迹为陈朝垂戒”^⑦。然而,诸如此类的解读,其实未中肯綮;梁代“兴亡之运,盛衰之迹”本身固然“足以垂鉴戒,定褒贬”,但何氏追述梁代“兴亡之运,盛衰之迹”的旨趣,却并非“垂鉴戒,定褒贬”,更不是“为陈朝垂戒”。

事实上,何氏本人对其撰述动机颇有明确的表达,这就是《梁典·总论》所提到的“穷愁著书,窃慕虞子”。此所谓“虞子”,即战国时曾任赵国“上卿”的虞卿,史称其“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⑧。何氏既以虞卿“穷愁著书”为榜样,其著述动机自然与虞卿相仿,亦当以刺讥政治得失为宗旨,只是对象改成了萧梁。除此而外,由于何氏身处陈代,故对其撰述目的又有不便明言者,于是也就将之潜藏于对《梁典》命名依据的说明之中,其《梁典序》云:

记事之史,其流不一,编年之作,无若《春秋》,则鲁史之书,非帝王之籍也。案三皇之简为《三坟》,五帝之策为《五典》,此典义所由生也。至乃《尚书》述唐帝为《尧典》,虞帝为《舜典》,斯又经文明据。是以典之为义久矣哉。若夫《马史》、《班汉》,述帝称纪,自兹厥后,因相祖习。及陈寿所撰,名之曰志,总其三国,分路扬轡。唯何

方面远迈何《典》。

- ① 分别详参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83页;前揭陈光崇《刘璠、何之元各撰〈梁典〉》;杨翼骥《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 ② 《魏书》卷98《岛夷萧道成传》作“宝卷酷乱逾甚,其尚书令萧懿虽有大勋,忌而杀之,并杀其弟卫尉卿萧畅”。但据《梁书》卷22《太祖五王传》、《南史》卷51《梁宗室传上》及《资治通鉴》卷143《齐纪九》“东昏侯永元二年”条记载,与萧懿同时遇害的并非萧畅,而是萧融。
- ③ 据《隋书·许善心传》记载,是书在许亨卒时虽尚未定稿,但已撰就58卷(《隋书·经籍志二》作53卷)。至于许氏卒年,诸书所载虽有抵牾,却必在何氏撰成《梁典》之前。
- ④ 《陈书》卷34《文学传》所录何之元《梁典序》,第468页。
- ⑤ 何氏对于史料的“裁断”,明显受到宋齐之际的著名史家臧荣绪的深刻影响,此观其《梁典序》可知:“案臧荣绪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实资详悉。”
- ⑥ 《陈书》卷34《文学传》所录何之元《梁典序》,第467页。
- ⑦ 向世陵《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页。
- ⑧ 《史记》卷76《虞卿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375页。

法盛《晋书》（即《晋中兴书》）变帝纪为帝典，既云师古，在理为优。故今之所作，称为《梁典》。由此可知，何氏之所以将其所撰之书命名为《梁典》，是因为在他看来，“典”是专门用于载述帝皇事迹的图书形式^①。他对“典”义的这种理解及其将所撰之书命名为《梁典》的这种作法，其实隐含着对陈氏政权合法性的否定，这正如同他将《梁典》叙事下限下拉至公元573年（陈文帝太建五年），其意就在于替梁朝与陈氏政权争正统^②。据此又可知在何氏的历史哲学中，虽已不再拘泥于华夷之辨，却依然未曾摆脱正统论的束缚。

在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幾看来，裴子野《宋略》、吴均《齐春秋》、何之元《梁典》等书，虽则其名“各异”，却“大抵皆依《左传》为的准”^③。然而，何《典》的编纂体例显然并非纯粹的编年体，《梁典序》所谓“事有始终，人有素行，本末之间，颇宜铨叙”云云，即表明其书体例实寓纪事本末于编年体之中。考纪事本末之体，原本滥觞于《尚书》^④。何《典》既按时间先后又分六“意”以叙梁代史事的这种谋篇布局，就其渊源而论，可能是对《尚书》的模拟。因为何氏既以《尚书》之“典”命名其书，也就不能排除他在编年叙事的总体框架下，选取《尚书》所首创的纪事本末体，用以“铨叙”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可能性。

三

何之元的《梁典》，应该是汉末两晋南朝时期成书时间最晚的编年体史书，大体上能够代表编年体及编年史在南朝末年的发展水平。因此，若将该书与荀悦《汉纪》、干宝《晋纪》、袁宏《后汉纪》、裴子野《宋略》等同类史书做一纵向比较，必将有助于增进对编年体及编年史在汉末两晋南朝时期总体演进趋向的把握。

编年体是先秦时期被最为广泛采用的史书编纂体例，并因此出现了诸如晋《乘》、楚《杕杕》、鲁《春秋》之类的不同形式的编年史。然而，一则因为受到新兴的纪传体史书的冲击，二则因为在编纂体例上存在着不少缺陷，三则因为当时史学尚附骥于经学之下而不受重视，故而编年史曾经长期衰歇于西汉中叶至东汉末年之间。这种局面，自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荀悦受敕撰成《汉纪》以降，尤其是在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竹书纪年》出土之后，得以完全改观。此后，编年体不但被视为“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⑤，而且学者“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⑥，从而迎来了编年史创作的又一高潮。编年史的复兴，其因固然不一而足，但归根到底，还在于历代史家对编年体的迭加革新和努力完善。这其中，荀悦《汉纪》的“通比其事，（例）[列]系年月”^⑦，干宝《晋纪》的肇为“谱注”以备委曲^⑧，袁宏《后汉纪》的“言行趣舍，各以类书”^⑨，对于复兴编年史的贡献，尤其值得称述。对于干宝盛誉编年而深抑纪传之言行，刘知幾也曾深致不满：

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千《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⑩

平心而论，干宝之论固然有失偏颇，刘氏之说亦非的论，而且易使后人误以为编年史在整个汉末两晋南朝时期皆与纪传史分庭抗礼。事实上，编年、纪传二体诚然各有其美，大可相辅而行，但编年史足以与纪传史相颉颃之格局，充其量仅存续于东晋一代。时至南朝，虽然撰述编年史者不乏其人，编年之作其数亦颇可观，甚至还派生出被视为“杂取”编年、纪传之法而为之的“实录”这种新的编纂方式，但总体而论，南朝时期的编年史，既逊色于汉末两晋之世的同类著述，也不如记载同一对象的纪传体史书，且明显呈现出江河日下之趋势。故此，大抵可以晋末宋初为界，将编年史在整个汉末两晋南朝时期的发展演变分为前后两段。前期，尽管也时有起伏，却大体上处于上升阶段；后期，则反是。

自入南朝以来，编年史之所以每况愈下，榘而论之，似乎不外如下两端：

第一，越来越缺乏创新精神。譬如“总论”之体，昉自东晋干宝的《晋纪》，时当齐梁之际裴子野著《宋略》，虽效法《晋纪·总论》以成《宋略·总论》，却也并非无所革易，但至何氏撰《梁典·总论》，无论编纂体例抑或行文风格，皆几乎悉数因仍《宋略·总论》而未见有何新创。编年史在体例上原本就存在着不少尚未克服的弊病，自兹以降，不但无从与纪传体史书相辅而行，更在事实上湮替不振将近四百年之久，直至《资治通鉴》问世。

第二，愈益深刻地受到文学的影响，由此导致了诸多弊病。首先表现在叙事上，其所录文词过于浮秽，与史书性质有所

① 当然，何氏以《尚书》之“典”为“帝皇之籍”的说法并无新意，因为早在东汉王充的《论衡·正说篇》中，就已提到“《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

② 对于何氏名其书为《梁典》之举，刘知幾在《史通·题目》中直言：“此又好奇厌俗，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刘氏的这种诟病，表明他其实并不理解何之元的撰述旨趣。

③ 《史通通释》卷1《内篇·六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页。

④ 据蒙文通先生考证，纪事本末体滥觞于《尚书》之说，始创于朱熹《晦庵集·跋通鉴纪事本末》，尔后张大千于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书教》。详参《中国史学史》第一章之四《论〈尚书〉之传写与体例》，见前揭《经史抉原》，第240页。

⑤ 《史通通释》卷9《内篇·烦省》引干宝《史议》，第263页。

⑥ 《隋书》卷33《经籍志二》，中华书局，1973年，第959页。

⑦ 荀悦《汉纪序》，可见张烈点校本《两汉纪》上册《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页。

⑧ 《史通通释》卷2《内篇·载言》，第35页。

⑨ 袁宏《原序》，可见周天游《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⑩ 《史通通释》卷2《内篇·二体》，第29页。

《郡斋读书志校证》卷5史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

抵牾。“虚加练饰”、“体兼赋颂”^①，虽是汉末两晋南朝史坛的通病，但相对而言，汉末两晋时期尚可，譬如荀悦《汉纪》，即以其“辞约事详，论辨多美”^②而为历代所推重，又如干宝《晋纪》，亦号曰“简略”，“咸称良史”^③。然则南朝诸史，即便是足以代表南朝编年史最高成就的裴子野《宋略》，也已失叙事简要之义，不但“务饰虚辞”^④，且其“所录文章，颇伤芜秽”^⑤。至于何之元的《梁典》，其“秽累”一如《宋略》，因而备受刘知幾的讥评^⑥。其次表现为史实可信度不高。譬如《宋略》，既有的相关研究业已指出，该书虽在具体表述上力求字词的简洁，却既不关心所录文章过多是否有违史书性质，也不甚在意所载史实的可信度，因而其史料价值不如同记刘宋史事的沈约《宋书》^⑦。何《典》亦复如此，它虽然在文字表达方面较为可观^⑧，但在甄别史料真伪方面却很成问题，其传世佚文的颇多舛误，即其明证；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何氏乃善文之士而非良史之才。

对于何《典》构置《后嗣主》以详载王琳“崇立后嗣”之始末的这种措置，明代史家朱明镐在所著《史纠》卷2中曾予以高度评价：

梁之亡也，不亡于敬帝禅陈之年，而亡于王琳遇获之年。王琳一日未死，则梁一日未亡。敬帝之后尚有明帝，此梁本纪之所宜收者。王琳乃心王室，天之所废，必欲兴之，衍梁祚至七十五年之久，此梁列传之所宜收者。姚氏修本纪，则删明帝，修列传，则削王琳，不如何之元所纂《梁典》，犹存其行事而不没，其实为一时之良史也。……梁代之史，要当以何氏之《典》为正。

然则朱氏此说，殊为未见。平心而论，姚氏《梁书》不为王琳立传，委实有待商榷，但该书不列所谓的《明帝纪》并将下限断在梁敬帝禅陈之年（557年）的这种取舍，无疑建立在准确把握梁朝盛衰兴亡之迹的基础上，较诸何《典》，显然更为客观、合理，故为《资治通鉴》所因袭。进而言之，何氏分六“意”编次梁代史事尤其是将下限定在陈文帝太建五年（573年）的这种作法，不但过多地臬杂了他的个人好恶，而且在事实上构成了对国史编纂惯例的毫无意义的反动。其书之早佚，可谓良有以而然也。

Comment on He zhiyuan' *LiangDian*

TANG Xie-jun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He zhiyu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structure and compose of *LiangDian* was affected by his whereabouts. According to the survived texts of *LiangDian* we not only know its writing time approximately, but also know other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historical sources, the compile style and the writing purpose. On the whole, both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history are of little value, which is the example that the chronicle was ebbing.

Key words: whereabouts; chronicle; the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records; conception of history

（责任编辑：黄云鹤）

① 《史通通释》卷6《内篇 叙事》，第180页。

《后汉书》卷62《荀淑传附荀悦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062页。

《晋书》卷82《干宝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0页。

《史通通释》卷6《内篇 叙事》，第167页。

《史通通释》卷17《外篇 杂说中》，第484页。据《梁书·裴子野传》记载，《宋略》在梁代颇受好评，被誉为“叙事评论多善”。但诸如此类的对于《宋略》的褒美，在很大程度上缘自时人出于低贬沈约《宋书》的需要；就《宋略》本身而论，其无论叙事抑或史论，虽不乏可宝贵之处，却也难称“多善”。

《史通通释》卷5《内篇 载文》，第126页。

⑦ 详参拙文《也论裴子野的〈宋略〉》，刊《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⑧ 也因此，其《梁典序》、《梁典·总论》分别为《陈书·文学传》、《文苑英华》所收录。